

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 独立与发展（中）

北京拉拉社区口述史

同语于 2009 年 2 月开始策划北京拉拉社区发展口述史项目，同年 6 月正式启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共采访社区活跃人士 38 人，考察了 9 个民间小组和活动空间。从 2016 年 9 月开始，同语固定于每周三推送个人口述故事，这一次，我们将把目光转向北京拉拉社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二十余年间的发展，试图通过重要的事件、个人与时间点来拼接出北京拉拉社区、组织与运动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上周开始的三期推送中，我们会着重介绍 1998-2003 年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今天的文章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姐妹小组的故事。



图片来源：GhanaClass.com

北京拉拉社区历史发展脉络

1997 年以前：同志社区的萌芽

1998 年至 2003 年：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2004 年至 2007 年：拉拉社区的运动化与组织化

2008 年之后：挑战与转型

1998年至2003年 拉拉社区的独立与发展 (中)

北京姐妹小组

女同志大会的成功举行促成了北京姐妹小组的成立。谈到小组成立的原因，据当时的几位骨干分子回忆，其一，是直接源于女同大会上参会代表们强烈的工作热情，在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这份紧密的联系和运动的热情继续保持下去，并应该将会上所讨论的各项主题落实到现实的行动之中；其二，这几位骨干分子也提到，1998年苏茜离开了北京回到英国，何小培也因为工作和读书的原因而离开北京，北京的拉拉社群一下子失去了两位十分重要的组织者和号召人。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坚持开展活动，似乎有必要借助一个更加固定化和组织化的实体来推动。从这个角度来说，姐妹小组的成立实际上是对从1995年到1998年间已经积累起来的一些拉拉社群的人力资源加以整合和组织化的一种形式和成果。

最初的北京姐妹小组，拥有5到6名核心成员，她们基本是参与了女同大会主要组织工作的骨干分子们，比如李京、石头、Kim和成林等人。在组织架构上，姐妹小组并没有原则上的单独负责人或者领导，各项事务基本由大家共同商量决定。在资金方面，北京姐妹小组从建立初期便开始向海外申请资金，并得到了一定的资助，姐妹小组用这些资金租了一处房子，主要用来进行小组的日常办公和组织活动，比如定期的沙龙讨论会和观看电影等等。而在工作执行上，小组较之前的女同群体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分工，重点工作则围绕女同大会所确立的热线、杂志、网络等几项展开。

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后，北京姐妹小组接听热线的工作也开始固定在那里进行，这就使得这条专门的拉拉热线摆脱了此前北京同志热线那种“居无定所”的状态。但是改善的工作环境并不一定立刻带来更好的工作成果。拉拉热线一开始便面临着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打入的困难局面。为了扩大知名度，她们想办法将这条热线的信息刊登在了某些英语学习报上。打入热线的人数慢慢变多，而遭遇的情况也慢慢变得复杂，比如也有男性由于好奇心而拨打了拉拉热线。闲还听到一个有关拉拉热线的有趣的细节，为了找出更多的拉拉，姐妹小组的成员曾经照着电话黄页挨个打电话，问接电话的人是不是拉拉。

在姐妹小组的推动下，北京拉拉社区的第一份杂志——《天空》也逐渐做了起来。这份杂志中包括了很多拉拉的情感类内容和一些相关的资讯，希望借此发出拉拉自己的声音。之所以为杂志取名“天空”，据Kim说，是因为“天空这个名字实际上是跟‘半边天’有关系，因为妇女是‘半边天’嘛，那我们想我们是lesbian，我们就是整个天空了嘛，所以我们就叫‘天空’。”《天空》杂志上还设有一个“论坛”的栏目，以供大家讨论、交流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话题有时来源于小组定期组织的沙龙讨论会。而参与“论坛”讨论的方式则是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通信。Kim对这个栏目曾做过这样的评价：

Kim：杂志上的论坛栏目时效是非常慢的。就是我们说，下一期我们讨论，比如说哈，gay要不要和lesbian假结婚的事儿，那么大家就会写信谈谈看法。等我们收到信、再整理啊什么的，差不多三个多月就过去了。然后下一期就是另一个话题。沙龙的话就是会召集大家来，比如说gay要不要和lesbian结婚这个问题，大家就会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她自己有这个经验的，那她就说啦，哎呀，那就别结婚啦，烦死啦，什么什么的，很多问题啊。那有的人就是家里压力大的，那她就说，可不可以找一个好点儿的gay呀，什么什么的。



第一期《天空》杂志封面（2000）
石头供图

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天空》杂志并没有固定的出刊日期，一般是什么时候做出来就发布一期，有时要几个月，更长的则有过接近一年才出一期的时候。杂志的执行编辑也是由几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轮流担任。当然，除了主要为拉拉社区的内部沟通和交流提供舞台外，《天空》也包括一些资讯类和采访类的内容，比如杂志曾经采访过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并由Kim在那一期中撰写了相关的文章。



第一期《天空》杂志目录（2000）

石头供图

另外，姐妹小组还定期在办公室组织讨论会、观影会等各种活动。Kim曾谈到当时这些活动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当时北京拉拉社区的情况也是密不可分的。

Kim: 当时的社区人很少嘛，然后呢，反正就是，搞一次（聚会活动）也不容易。大家就是会打电话问，谁来不来啊——就有这个跟那个有闹矛盾，就说谁来那我就不来啊，就那种的，小孩子那样的。我当时的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打电话，‘啊，你们又闹矛盾了？没事没事，她不来，你来吧’，就那种（笑）。然后等她们来，俩人都来了，她们也不好意思当着人吵架，就那样。要不然人家……以前的事儿哈。就是那时候大家，少嘛，一共就二三十个人，就很容易有各种小矛盾啊什么的。……我们会轮流打电话（通知大家参加活动），但这是个很累人的工作，因为你要给她们打电话啊，要解释啊，沟通啊，要连哄带骗的那种（笑）。

总的来说，初期的北京姐妹小组所举办的大多数活动，仍然主要是非公开或者半公开的社区内活动，正像石头所说的，那时候“最重要的活动其实并不是说要去干别的，就是能有很多人到这里来，大家在一起做事情聊天，这个是那时候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不过，在其后的近三年时间里，姐妹小组却始终困扰于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因为姐妹小组成员已经分散多年，有关这些发生在小组内部的矛盾冲突以及它们真实的原因，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了解其全部情况了。只能根据几个小组成员的回忆来还原一部分当时的情况。

据石头等人的回忆，姐妹小组内部矛盾的焦点在于较早参加同志活动的积极分子李京与在1998年同志大会以后逐渐加入的Kim这两位小组的核心成员之间。关于李京与Kim之间矛盾的缘由，有一种说法认为，是由于两人都个性鲜明，但彼此性格合不来。石头曾谈到：

石头：(姐妹小组) 1998年成立，2001年解体。因为到2001年的时候，就是后来，是因为那个，Kim，我们不是在一个小组里面么，那时候都是李京，她是召集人么。然后Kim个性又不一样，她们两个有点合不来，就有点处不来那种。李京看不惯Kim.....可能，李京就觉得她（指Kim）的性格比较任性。然后那Kim就觉得，不知道Kim对李京是什么感觉，反正也是有意见，就是这样的。那李京.....就退出小组了。



约2000年时的kim
来源：豆瓣小组“纪念kim（邬烈兴）”

发生在李京与Kim之间的这场矛盾冲突，以2000年李京等几位小组核心成员的退出而告终。而这又多少导致了姐妹小组在此后渐趋解散。因为在此之前，李京不仅是姐妹小组中“最重要的召集人”（石头语），而且她还长期担任着姐妹小组的外部联络工作。李京离开之后，不仅小组的外联工作、特别是与那些曾参加1998年女同大会的外地代表们的联络变得越来越少了，就连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络也没有以前那样密切了。石头回忆说，在李京和小燕（音）等人退出小组之后，她自己于2000年以后逐渐与包括李京在内的很多朋友失去了联系，慢慢转而忙于自己的事情了。而李京在离开北京姐妹小组之后，似乎也很少再现身于同志活动中了。

李京等几位核心成员的离去，并没有使姐妹小组内部的矛盾得到实质性的缓和，相反，小组矛盾不仅继续存在着，而且在随后的2001年，在Kim等人筹办女同性恋文化节的过程中，这些矛盾似乎不断地升级。我们捕捉到一个历史的细节：

石头：她们做文化节的时候，那几个拉拉突然叫我去吃饭，说要跟我聚一次，要跟我商量事情。除了Kim之外所有的人，都要跟我见面。那见面是为什么呢，她们就在说，哎呀，好像做这个文化节有问题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如果太是张扬的话，对同志本来就不利。比如说你（Kim）要请那么多媒体，你有没有考虑来参加的同志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大多数人是不想公开的。然后呢，她们说，做这样的活动目的好像是为了某个人要出国，然后干完这个活动她（Kim）就可以去美国了。她们当时会这样认为的，就是这个小组的人当时都这样认为的。.....（她们）反正就是认为这个文化节跟同志没关系，因为你请的人也好.....她们觉得这跟同志没有关系。（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搞这个大家还这么觉得不踏实，然后意见很大很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跟Kim说呢？你跟我说，我也一直没有参加这个活动，不太知道。但她们还算信任我，就找我来倾诉，然后还希望那个我来做事情，我能站出来做事情。（我觉得）当时她们的那个态度出来得有点极端，我就觉得这样不对。我说这个时候了，你们这样来讲，不对。我就认为，大家有意见应该当面提的，你来跟我讲，那不等于背后讲嘛。因为也许是Kim她很强势了，她讲话的时候不会去考虑别人的观点。我想她们也许（跟kim）讲过的，但是争论之后也许Kim当时就决定了，我猜是这样的哈，要不然她们怎么都这么大意都跟我讲。

上面这段回忆反映出姐妹小组内部在关于筹办文化节的问题上存在的一个重大的分歧点，就是**很多成员并不想把文化节做得太公开化，不想与媒体和非同志社区关系过于密切**。但是，在当时的姐妹小组内已经处于某种中心地位的Kim，却联系了很多外界媒体和相关人士。这个行动理念上的矛盾显然并没有在姐妹小组内部通过沟通、协商等形式得以解决，从而导致了小组成员对Kim的种种不满和猜疑。

对后来的人而言，也许追究当初的这种种猜疑与指责没有多少意义，但是我们透过这些真实而又有些苦涩的回忆，看到它其实正反映出存在于北京姐妹小组的一些深层问题。闲曾在谈及姐妹小组的时候提到，在姐妹小组内部，一直存在着对组织内个人关系的处理问题：

闲：（北京姐妹小组内）也有一些个人的东西，就是比如这个小组里面谈恋爱，谈到最后又分手了，然后这个小组就分裂了。尤其是在最初期，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好像就是女同志的个人关系问题，经常会极大地影响她们组织的形态，或者是运动的（效果），就是本来这人做得挺好的，后来就是因为分手，然后这人就没了，然后这个运动就没了。

而石头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也曾说，当时的北京姐妹小组确实在组织和管理上面临不少问题，她认为这突出地表现在小组成员比较缺乏一种民主意识，小组本身也缺乏一套民主的决策和运作机制。

石头：同志社区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国家机构的那种，我本来对那种机构就……哎呀，人一旦做了这种权力上的事情，总是会出问题的，我是这么认为。或者说没有民主的话，是不行的。虽然那时候我也不太懂民主，但我当时觉得她们肯定是没有民主了，才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她们是想以非民主的方式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当时我们都没有想过应该选一个……轮流做（的主席），一个轮值主席这样的概念。（当时）就是做事情，没有什么这种概念上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2000年李京等人宣布要退出小组的时候，包括石头在内的很多成员虽然都感到“很遗憾”，却并没有想出什么真正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挽留住同伴。



图片来源：Photo4facebook.com

2001年5月，主要由北京姐妹小组的Kim等人筹办的**女同性恋文化节在北京开幕。结果开幕当天，就遭到了政府的“镇压（Kim语）”**。警察不仅封锁了现场并对在场同志——进行了身份核查，还带走了包括Kim在内的主要组织者进行问话。而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三年（从1998年开始），北京姐妹小组的各项非公开性活动从没有遭到过政府的公开检查，据石头谈到，即使当时的活动可能有便衣警察监视，也没有对小组进行过公开干预。之所以出现这种多少出人意料的结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2001年的中国国内，当时的法轮功事件余温未消，整个政府和公安系统对于聚集性活动的敏感度仍然是非常高的。

Kim曾详细描述了文化节当天被警察叫停后的情形：

Kim：他们（指警察）的意思就让我们都大家回去嘛，就不要搞活动了。但人家都五湖四海来了，也得让大家过个节日啊对吧。结果我们到哪里，那里就一堆便衣警察就跟着我们，比方说我们进到那个星巴克咖啡店里面，我们就发现，哇！那一大屋子都是便衣（笑）。就特莫名其妙那种。我们就几个人就喝喝咖啡，就没地儿去了嘛，也没活动了。好几张桌子就是那便衣，而且他们就是特明显的那种，你知道么，就是那种中年男人，一看就是便衣，就根本不会去星巴克那种人就在哪儿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节的活动只好被迫转移到当时正在开枫吧的老板乔乔的家里进行，活动也变成了主要是组织参会的同志在乔乔家进行了三天的观影活动。

Kim：后来我们给迫得没处去了，我们就到乔乔家里去了（笑）。当时乔乔和她女朋友一块租了个两居室，然后她很豪爽的，然后我们说，我们给迫的没地儿了，去哪儿那一堆人跟着我们嘛，然后我们说，哎呀去人家家里他们（警察）不能说……最多在人家楼下等着，我们就到乔乔家去了（笑）”。

在乔乔的访谈中她也提到此事：

乔乔：后来那时候她们（指Kim等人）没办法，再加上内部摊钱，然后Kim找上我来了，（说）“要不乔乔帮个忙吧”，我说“干嘛呀？”（Kim）说，合着在你们家看电影行吗？我说着什么？（Kim说）“看那个拉拉的电影”。她给我钱，我说不要钱，不挣那份钱。……连在我们家三天（看电影）。Kim自此对我的态度就改观了，就对我挺好的。……后来Kim还不错，从头管到尾。……最后四十多口子没地儿住，没人管，后来全在我们家待着，……有的住在那儿（指乔乔当时的家），我们家都打地铺了，然后Kim给我钱我也没要，我说我挣不了这份钱，我也不挣，我帮个忙就行了。电话被追踪，没人敢接这个活儿，然后我说，那我接吧。（访谈员：那当时也要打点一下关系什么的吧？）没事儿，我们家部队的。

那么，在这次事件发生时，政府究竟做了哪些反应和处理呢？我们通过对Kim的访谈多少能够了解到一些：

访谈员：我很好奇啊，那些警察怎么知道你们的？

Kim：我后来等到他们审问我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有窃听我的电话，就是我说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之前，我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而且最早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来抓我们的时候，那个人是刑侦大队的，他说他是专门抓法轮功的（笑）。他就吓我说，‘像你这种人，我就把你当法轮功抓起来你都没话说，属于非法集会’（笑）。他的意思就是说，随便他就可以把你安个罪名，说你是法轮功你有什么招儿啊，对不对，就把你发配去劳改去了，他就这么说。所以那个时候……现在可能文明点了呵。我后来也没跟他们有什么交往了，我就知道了（笑）。那个时候是，他就反正审讯嘛，他有规定说，不能把你拘留超过二十四小时嘛，然后他就把你审讯审讯，到二十三小时了给你放走，但你刚走一会儿，他又把你叫回来了，又重新开始计算二十四个小时，就那种（笑）。’

访谈员：你觉得警察到底怕的是什么？

Kim：我想这个就是国家的一个意识形态吧，他就是怕你集会。当你集会了，形成了一定的力量以后，你人多嘛，人在一起了你有一定的力量，对吧。他其实审问我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的，他说，你跟另外一个人在大街上的时候随便干什么我都不管你，那如果你一堆人在一块儿商量一个事儿，那就有问题了。

访谈员：那时候是不是因为法轮功闹的事儿比较厉害，所以国家对这些事儿都很敏感？

Kim：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真不明白这个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吧。他们就觉得一堆人在一起在那儿干嘛呢。他们当时就把我们电脑的资料啥，很认真的全部拷下来，也不知道在那儿研究个啥啊，看啊，什么的。

Kim还谈到，在这次事件之后，她被列到了黑名单中，此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无法进入自己的邮件系统：



图：王冬冬，2001年

2001年的同志文化节被政府叫停，对于整个同志社区的运动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Kim：那次活动（指文化节）对当时女同志的社区打击是蛮大的，因为就是这个事儿当时大家都挺害怕的嘛，因为就是他当时来（指警察在现场）就是看了每个人的身份证，他当时是可以到你家里和你的父母说啊什么的，所以当时对我们打击是非常大的。然后，慢慢到后来可能就越来越好了吧。但是我自己可能就是，那次就是对我的打击也蛮大的。

石头：在门缝里做事很不容易的，本来好不容易能找来这几个同志，人家聚在一起，然后出问题了那肯定打击特别大。

石头还指出，一方面，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反应过度了；另一方面，石头也认为，Kim等小组成员作为文化节的筹办者，在筹办中也表现得不够谨慎：

石头：好多人是胆子好小的，又不是说要闹什么革命，又不是说要颠覆政权，同志是想找一个想说话的地方才聚在一起的，才来参与这个文化节。结果你被警察（镇压），她会怎么想。如果你是因为政治的原因，你想天安门去干什么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她不是想干这些的。为什么大家都一下子就鸟兽散那种感觉，因为太意外了嘛。政府做的不好这是肯定的，没必要这样。

我觉得小组（也应该）慎重一点。为什么我们做那个男女同志大会会顺利举行呢？（我们）是很慎重的，虽然我们在说话中很大方。我们都是酒吧里说话，都没有什么关系，去的好几个酒吧还是我认识的朋友开的。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讨论过男女同志大会的时候，在新华社旁边的一个朋友的酒吧，我们在那都没什么，公开说话没什么关系。可是你真的安排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保护别人的，也要保护自己的。



第四期《天空》杂志（2001）
来源：微博@voicayaya

在文化节被叫停之后，Kim去了美国。随着她的离去，北京姐妹小组逐渐解散，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不仅再没有组织过公开活动，平时的小组讨论也没有了，热线也随之撤掉。唯一“幸存”的《天空》杂志由海底（志愿者名）继续做了下去，但是杂志没有再印刷过，而是以网络杂志的形式继续存在了三年。

多年以后的今天，作为姐妹小组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石头对它这样评价说：

访谈员：你们在做姐妹小组的时候，你觉得你们做得比较成功的地方是什么呢？

石头：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人给召集过来了。真的是我们不分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参加。可以说有不同的人来，包括我们小组里面挺核心的人程艳（音），她就是真同志。我觉得这点……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我觉得这可能比较好的地方。

相比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女同志活动和女同小组雏形，闲认为北京姐妹小组“在它的组织结构和运动理念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区小组，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但是，从运动阶段的认识和运动策略的选择方面，姐妹小组“跟北京的社区有点脱节，因为它自己走得比较远”，尤其在文化节的组织上显得“太超前、太政治化”，结果“社区大众会排斥它、接受不了”。此外，如前面提到的，小组在处理一些组织内的个人关系和个人矛盾冲突方面也显得不够成熟，缺乏足够的制度建设和民主意识。总的来说，北京姐妹小组是早期同志运动的一次非常宝贵的实践，也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参考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